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

吕日周

山西经济出版社

山西省
改革开放分析

吕日周

山西经济出版社

书名：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

作　者：吕日周　编
出版者：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市并州北路69号）
邮　码：030001
发行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山西晋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　2.125
插　页：
字　数：43千字
印　数：00001—10000册
版　次：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77—825—6/　F·825
定　价：　3.00元

责任编辑：张惠君　社长：陈宇华　总编辑：张凤山

吕日周

山西省大同县落阵营村人。1969年山西大学毕业，先后在大同齿轮厂当锻工、广灵百疃村任党总支书记；在中共雁北地委、地委政策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83年后，任中共原平县委书记、忻州地委委员；中共山西省委五届候补委员；中共朔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山西省体改委副主任、主任和省政协常委等职。兼任山西大学教授，现为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及国务院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曾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著有15本书，400余万字。

一、山西省改革开放成绩喜人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18个年头。其间，山西省改革开放的成绩有目共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商品粮专业户、县级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典型单位的对外开放等，都走在前列。特别是近几年来，山西人民在以胡富国书记为代表的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纪委的正确领导、监督和支持下，高举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两面旗帜，改革开放的成绩更加显著。各部门、各地市落实重要工作责任制，在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太原市改革试点、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税收、物价、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开发区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小型企业改革北有朔州、中有榆次、南有绛县的格局初步形成，在国内受到好评。省科委和省工商局职能的转变，也引起全国的重视。在大中型企业中进行“深化改革，强化党建”的总结，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及专家的充分肯定。在运城地区的62户企业中进行的破产、兼并，成为世界银行关注的焦点。省供销社、化工厅、土地局、统计局、邮电管理局、太钢等几家体制改革的经验，在全国进行了推广。胡富国书记和孙文盛省长部署朔州小型企业“同一思路，十种模式”的改革引起中央和各省市的重视，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了现场会。孙文盛省长抓的山西化工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用改革的办法在社会筹资1000多万元，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制氯丁橡胶设备投产，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卢功勋主任安排的煤炭体制大调查，明确了改革思路，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当时任省长的胡富国同志和任常务副省长的郭裕怀同志亲自抓的杏花村汾酒厂股份制改造被全国专家誉为山西模式。近5年山西出台各种改革方案36个，这些都反映出省领导抓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更加喜人的是，全省打好“四大战役”、实现“五个一工程”，建设太旧路、飞机场、高架候车室、引黄工程等，在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又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二、山西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力度不够

山西改革开放工作成绩巨大，促进了全省经济的发展，这是事实。因为从1978年至1994年，山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倍，1995年又有新的增长。这是纵向比，自己的昨天和今天比。但改革开放力度不够，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山西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事实。当然，这是横向比，是和全国各省、市、区比。以1978年和1994年相比，山西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全国第15位退居第20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第7位退居第18位。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1985年居全国第10位，1992年下降到第18位，1994年猛跌到倒数第1位，比全国平均水平相差近1000元。太原市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4元，比全国省会城市平均水平低480元，比中西部省会城市低450元。以

1992年为例，山西人均国民收入在全国排第20位，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第21位，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第21位，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第28位，粮食单产第26位，传真机拥有量第27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第18位，社会服务机构第19位，项目建成投产率第28位。和全国比，经济发展差距呈拉大的趋势。我们评价经济发展的先进与落后，主要的应该是自己和别人比较。现在，省委、省政府大胆地并公开地承认这个落后，这是最彻底的实事求是，是政治上的胆略和勇气。

那么，怎么才能明白山西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开放力度不够造成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间山西的经济发展位置：50年代，山西的综合经济水平在全国各省区排第七、八位，到了60、70年代，也仍然保持着一个中上游的水平，差距拉得并不大。如果从1978年以后全国依然不改革开放的话，恐怕山西还会保持这样一个位置。但是，进入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全国不改革开放，山西不落后；全国改革开放，山西落后。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改革开放力度不够造成了山西的相对落后。

其次，山西和外省比，经济落后还表现在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兴办开发区以及引进外资等方面。从1992年的数字看，山西的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的0.57%，居全国第21位；投资额占全国的0.54%，居全国第22位。与广东省相比，1992年山西的外贸进出口总额7.07亿美元，仅是广东省280多亿美

元的1/39左右。时至今日引进外资的额度还不及广东省顺德一个县。如果和沿海省份比还不足以说明山西落后问题的话，那就再和周边的内陆省份陕西、河南、河北省比较。以1989年之后兴办开发区为例：山西共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9个，而陕西22个，河南28个，河北35个；山西区内面积近13KM^2，河南19.3KM^2，陕西43KM^2；山西入区项目895个，河南、陕西1200—1300个，河北2393个；山西三资企业74个，陕西265个，河南389个；山西利用外资3亿美元，河北、河南各4亿多美元，陕西5亿多美元；河北、河南的产值比山西各多4倍多，陕西多8倍多。这说明不是山西人起得迟、睡得早、流的汗水少，而是说明落后在改革开放力度不够上。

再次，从理论上看，我国的第一次革命是推翻旧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革命是改革旧体制，建立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党政机关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从而解放生产力，由穷变富。山西在致富路上走得慢了些，当然是改革开放力度差造成的。

这样分析之后，我们开个玩笑：不是山西改革开放得太慢了，而是别的省改革开放得太快了！也就是说山西改革开放力度不够，是指与发达地区和周边省份相比，人家的改革开放力度更大，势头更猛烈，人家的步伐更快，这就显得自己落后了。

多少年的实践说明，只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行，还必须有良好的运行体制。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意识到旧体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试图在体制外寻找突破口，走过大跃

进等运动的极端；也曾以激化生产关系矛盾的办法期望产生出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直至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办法实践证明走了弯路。分析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得了“体制病”，才造成了山西各级政府的“缺钱病”和广大山区人民以及一大批企业职工的“贫困病”。所以，解决山西经济发展落后问题，一不能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像有些同志说的：有煤有铁又有醋，样样资源都丰富。就是资金没出路，希望上级多补助。）把出路放在补助上，光靠伸手要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二不能走大跃进等大兵团作战的极端；三不能走大批促大干等体制外激化生产关系的路子。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必须从解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合理的运行形式、组织方式问题入手，寻找新的途径，我们的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三、分析山西改革开放力度不够的原因

人们也许会问：山西改革开放落后，难道是领导不想改革开放？是群众不愿改革开放？还是中层干部是顶门棍？是这个单位、这个人不改革开放？还是哪个单位、哪个人不改革开放？我们说都不是！从我们接触过的领导、部门的总体看，都愿意改革开放，都做了大量工作，而且都在为山西的改革开放力度不够而发愁、着急。所以，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是哪个领导或哪个部门的责任。因为，从大的理论讲，体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革命的对象是旧体制，而不是哪个单位或哪个人。对其中的原因，我们要具体分析。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认识问题，也有利益问题。

第一，是由于无海无边，夹于太行、吕梁两座大山之间的一个内陆省份的特殊地理位置造成的。改革开放后，国家首先在东南沿海以及沿边、沿江地区搞了特区、开发区、保税区，颁布了一系列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加之这些地区华侨多，便于引进外资，境外信息灵通，又使这些优惠政策得以加倍发挥。而对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采取了权力下放，经济扶助的优惠政策。那些省份边贸活跃，也令人羡慕。这些，我们都享受不到。我们只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布署，进行改革开放。某种程度讲，这一不可比的客观地理因素是造成山西“资源富省、贡献大省、改革慢省、经济穷省”的一个原因。

第二，是由于山西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重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其一，山西大中型企业多属能源、原材料领域，受国家计划经济控制比较紧，人、财、物，产、供、销各方面受到限制。特别是作为支柱产业的煤炭、电力行业长期受计划、受价格严格控制，这一因素使山西利益大量流失，煤炭每投入1元钱，只能赚0.045元，我们又必须把煤炭搞上去，支援全国建设。这在客观上也限制着山西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其二，山西重型经济结构属于投资主导型，需要注入大量资金才能维持正常运行，才能取得较好效益，这在国家统一资金调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较为有利的。伴随体制转换，在注入资金总量大量减少的情

况下，就使得山西改革一直在较紧的经济环境中进行，许多改革措施因缺乏承受能力受到阻隔。其三，我国体制转型的改革进程中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长期并存、双轨运行。有些省市场经济成份多，而山西是计划经济成份多，至今山西仍然是受计划经济控制较紧的省份。山西的改革开放碰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个最硬的、最大的、最难缠的一块：改革开放成本高，不能绕；改革开放出力大，效果差。这一因素是造成与兄弟省市改革开放差距的又一不可比因素。

第三，因为没有抓住不少历史机遇耽误了改革开放。上述第一、第二两条，我们强调了山西改革开放落后的客观原因。这是事实。但不能强调得太过份，不能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上不去的托词和借口。因为，山西在全国经济发展史和改革开放史上也曾经辉煌过。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同是一样的地理位置，那为什么明清以来三晋的驼帮、马帮、车帮、船帮等晋商集团能在国内称雄500余年，当时山西的金融、外贸等业在国内名列前茅？为什么阎锡山时代山西在经济上也是“模范省”呢？为什么在战争年代的太行山等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各个解放区也搞得最好呢？同样是受计划经济束缚，那为什么山西在农村改革的起始阶段，能够冲破学大寨禁区等各种阻力，走在全国的前列呢？为什么山西改革开放从农村走向县城的县级综合改革的数县经验能够轰动全国，得到李鹏总理和全国一大批专家的赞评和肯定，引来全国数万名参观学习的各界人士呢？为什么改革开放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山西出现了在全国也是走在了前列的朔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榆次和绛县的小型企业改革经验呢？为什么还出现了诸如大同肉制品厂、山西化工厂、太原平板玻璃厂、太原钢铁公司、杏花村汾酒厂、榆次环海锅炉厂、王坪煤矿、三飞不锈钢器皿厂、侯马服装市场、太原服装城、太原影都、天龙大厦、五一百货大楼、太原广东酒家、左云秦嘉股份公司等一大批改革开放的先进单位呢？

让我们来先分析解放前的几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状况：山西在内陆文化、农耕经济的明清时代，从本世纪初叶一直到辛亥革命的500年间，晋商的观念在全国是最先进的，其进行经济活动的运输队伍是庞大的、组织形式是集团性的、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产品销售是外向型的、不少原料来源是进口的。晋商之所以能控制中国的金融界和典当业，长途贩运皮毛、木材、盐、茶、丝、布、烟、酒、糖、粮，经营进出口贸易，首先在于他们目光远大，视野广阔，善抓机遇：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时，晋商反应最早，立即组织10多万头骆驼的庞大商队，向蒙古、新疆、西伯利亚运输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的物产。又如，清朝的盐业由政府专卖，许可证都掌握在两淮盐商手中。晋商为了插足赚钱最多的盐业，就在两淮盐商资金短缺时，慷慨借贷。条件是，让给部分盐业的经营权。后来，两淮盐业被晋商控制。他们就是这样把进出口贸易达到北欧、西欧、东南亚、日本，使山西成为全国的首富。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林说，晋中一带是“中国的华尔街”。当时全国的募捐，晋人捐银最多。1822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建议：“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从晋商衰败到今天只有80年的历史，衰败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连年战争造成的。

军阀割据时代的阎锡山，是在晋商趋于没落之后，秉承晋商传统的经商之道而兴起的。他紧紧抓住了军阀混战需要大量军火的重大机遇，抓住农耕时代向现代工业转化的历史机遇和帝国主义列强占领北京后要在国内兴办企业的机遇，舍得花钱引技术，高薪聘用科技人员，用灵活多样的手段，多种办法融通资金，采用了“顶股分红”、“赏功罚罪”的现代管理办法，30年代以110万银元作资本，经过5年经营，筑成860多公里的同蒲铁路，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冶金、电力、化工、机械制造、建材、毛纺、皮革、火柴、面粉、卷烟、造纸、印刷在内的总资产达2亿银元的西北实业公司，奠定了山西现代化工业的基础。把山西建成了当时的“模范省”。

邓小平同志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战斗了近10年的时间。根据地是处在大山环绕和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复杂环境中。但邓小平同志善于捕捉战争时期相对和平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时机，在根据地的区域内，提出了在战争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策略：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靠经济建设，二靠对敌经济斗争。他提出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攻方向，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作为生产的重心；尽一切努力招聘各类技术人员，特别是从敌战区招聘技术人员；制定奖励各种发明创造的有关鼓励政策。使根据地经济实力日益发展壮大，而且储备了支持大规模战争，支援外区的财力、物力。当时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上，太行根据地是走在前列的。

晋商抓住机遇，才能名扬天下；阎锡山抓住机遇，才

能独占一方；邓小平抓住机遇，才能繁荣根据地经济，壮大我军实力，为打败日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时代不同、阶级不同，但只要比同时代人更善于抓机遇，更努力去竞争，更富有开拓进取精神，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发展经济的道理如此，改革开放的道理同样如此。山西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具体领导农村改革的省委书记王庭栋等同志，紧紧抓住农民要冲破学大寨束缚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多次纵论农业学大寨中的“左”的错误，要求把真理标准讨论深入到农村基层，提出“谁搞调查研究，谁解放思想”，大批培训干部，使山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81 年，为了解决大同县农民李红承包砖厂进行雇工经营而在北部引起是不是搞了资本主义的激烈争论，王庭栋同志亲自给这位农民发去电报，支持承包经营者可以雇工的做法，使山西农村的思想解放进入新阶段。

同样，后来的省委书记李立功、王茂林等同志抓住全国进行县级综合改革的宝贵时机，确定省级改革试点县，制定社会经济综合改革方案，大胆实践，其成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从 1983 年开始，山西省委积极落实中央干部队伍实现“四化”的精神，破格选用了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开创了山西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继农村改革之后，1985 年 3 月，省委、省政府又发出了《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即 35 条），拉开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91 年省委、省政府又先后出台了搞活大中型企业、鼓励个体私

营经济发展和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等10个改革方案，加快了改革开放的速度。从1985年以后，省委为排除干扰，支持改革开放的试点单位，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侯马市委、市政府敢于在1990年率先制定放开和保护集贸市场的若干政策规定，使侯马服装市场的经济效益在全省独占鳌头；当初，大同市肉制品厂只有三口大锅，大雪又压塌了厂房，主管部门不愿再去管理。该厂一名工人充分利用因无人管束造成相对宽松的有利条件，大胆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把该厂建设成全省管理最严、效益最好的现代化企业，受到朱镕基副总理的表扬。

但是，山西却在另外一些时期错过了机遇，工作拉下了步子。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当江苏等省已经开始悄悄地大搞乡镇企业的时候，山西却行动迟缓，经济工作拉下一截子；又如，1988年“治理整顿”以后，广东、山东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解决经济过热问题，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又得到了大发展。而山西当时没有及时认识到本省经济不仅不热，不仅速度不快，反而认为山西当时的经济速度也过热了，只不过没有其他一些省热得厉害。所以，一些部门没有根据本省情况采取更好的措施，又不适当地压缩了投资规模，致使全省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的地区又错误地认为，要端正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抑制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此外，在机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方面，都有丢掉机遇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使山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与全国的差距逐步拉大。本来，山西应面对现实，承认落后，奋

起直追。但囿于纵向比较的思维习惯的影响，认为不能横向比，产生了一个“不可比论”，因而没有紧迫感，省内许多改革开放的试点经验未能在面上推广。而一些星星点点的上级主管部门不去管、上级主管部门不敢管和企业家顶住上级主管部门不让管的“三不”企业，那些因为偶然性、特殊性虽然搞得很好的企业，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任其自生自灭。

从山西捕捉机遇和丢掉机遇的实际情况分析，能够揭示丢掉机遇的深层次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每逢党中央发出号召，山西干部都能够以共产党员的忠诚，坚定不移地贯彻文件精神，雷厉风行地干起来，总能走在时代的前列。那时候，在大的方面似乎没有丢掉什么机遇。可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干部仍然以共产党员的忠诚响应党的号召，不断召开各种会议，坚决执行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怎么就会失去一个又一个的机遇呢？山西干部的优良品质没有变，那是什么变化了呢？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的事实告诉我们，原来是中国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变了。随着邓小平同志的指点，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要由封闭变为开放；要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的结构；要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等等。一些省率先开始了在文件里、书本里找不到依据的探索，开始了敢冒风险的创造。这样突然而来的形势，同时要求山西干部也像沿海干部一样要率先敢闯敢冒，根据省

情进行改革开放，但山西干部精神准备不够，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山西干部当碰到机遇存在于循规蹈矩和突破常规的矛盾之间、存在于理论和实践发生摩擦的矛盾之间、存在于贯彻中央精神和本省实际相结合的矛盾之间的时候，往往抓不住这些机遇。因为，这时候的机遇是潜伏着的，上级领导无法事无巨细地把什么都告诉你，红头文件也不可能一应俱全地把什么都写明白。只有按照文件精神，得其意而忘其言，深入到基层去实践，才能抓住机遇。还因为要在这些狭窄的矛盾区间选择一条抓机遇的路非常危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偏左点，就会犯“左”的错误；偏右点，又会犯右的错误。而在中间走出一条正确的路要有闯劲，有胆识，有不怕犯错误的精神。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经常流传的“自主改革”、“用足政策”、“用活政策”和“照猫画虎”的说法，表达了他们敢想、敢干的勇于实践精神。山西干部没有发明出这类语言，但山西群众却对干部发明了不少评论，比如：贯彻文件是“上下一般粗”；大会讲话是“中央说啥我说啥，我和中央不差啥”；开会的目的则是“为了走程序”；做事情“不会照猫画虎，只会照猫画鼠”。这可以看出，山西干部与沿海干部的差别有多么大。作一个比喻，同样是捉鱼，山西干部坐在岸边钓小鱼；沿海干部潜入水中摸大鱼。

可是，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有的山西干部调到沿海以后，他的行为方式立即就变化了呢？这就使得我们想到分析山西省情对领导干部做决策、抓机遇的影响。山西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比别的省更激烈、更残酷。山西是土改“搬石头”的受害省，是“大批促大干”的发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